

## 《文选》所录阮籍《咏怀诗》五题

顾 农

**内容提要** 阮籍的五言《咏怀诗》八十余首原题《陈留》，是正始十年（249）春高平陵之变以前不久他隐居于故乡时的作品，这里有许多篇什是讽刺批判当时的政治明星何晏及其后台曹爽的，同时也抒写了诗人深沉的人生体悟。萧统《文选》卷二三录入阮籍《咏怀诗》十七首，本文选取其中五首逐一予以解说。

**关键词** 阮籍 《咏怀诗》《文选》 李善 黄节

《文选》卷二三录入阮籍《咏怀诗》十七首，数量约占现存阮籍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的五分之一。这些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历来以“归趣难求”（《诗品·上》）著称。“难求”的原因有两条：一是要了解诗人写这些诗的具体背景，他当时有些什么见闻；二是诗人的感慨有什么更广泛更深远的意义。可惜历来的诠释类多不明这些诗的具体背景，以臆测代替实事求是的考辨，而又以牵强比附的诗史互证作为诗意的全部。“耳目之内”既不得要领，“八荒之表”更高高挂起，如此而求《咏怀诗》的旨趣，自然就很难了。关于这一组诗的主旨，《文选·咏怀诗》题下有颜延年旧注云：“说者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而李善本人在第一首之末注曰：“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离（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这里讲阮诗的背景避而不提“晋文代”（司马昭掌权的时代），而只称阮籍“身仕乱朝”，客观上似颇有深意，这样的提法可视是对颜氏旧注的异议以至于否定。又六臣注本《文选》“阮嗣宗”名下李善注又根据臧荣绪《晋书》提供了一条极其重要的信息“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容貌瑰杰，志气宏放。蒋济辟为掾，后谢病去。为尚书郎，迁步兵校尉。籍属文初不苦思，率尔便作，成《陈留》八十余篇”<sup>①</sup>，此独取十七首云云。由此可知《咏怀诗》原题《陈留》；查阮籍隐居于陈留乃是正始十年（249，四月改元嘉平）春高平陵之变以前的事情——他在出任尚书郎一职的前后蛰居于故乡。臧荣绪的记载实际上切断了《咏怀诗》与所谓“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之间的联系；也否定了“八十一章，决非一时之作，吾疑其总集平生所为诗，题之为《咏怀》耳”（吴汝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阮步兵集选》）这样一种看起来很有道理的猜测。事实上也只有将阮籍这一批诗的写作背景置于正始年间曹爽集团当路之时，了解他当时耳闻目睹了些什么情况，才可以理解，才能讲得通。依此来观察，可知这里有许多作品是讽刺批判当时的政治明星何晏及其后台曹爽的，同时也抒写了诗人深沉的人生体悟。

但是李善本人似乎并没有深刻理解他所引用过的臧荣绪《晋书》的意义，更未能作出进一步应有的发挥；相反地，他仍不能忘情于颜氏的旧说，所以其注释又写道：“咏怀者，谓人情怀。籍于魏末晋文之代常虑祸患及己，故有此诗。多刺时人无故旧之情，逐势利而已。观其体趣，实谓幽深，非夫作者，

<sup>①</sup> 在宋刊明州本《文选》中，此段注文在“良曰”名下，末云“善注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第345页）；而在《四部丛刊》影印本六臣注《文选》中，此注出于李善，末云“向注同”（中华书局1987年版，中册，第419页）。可知此注先出于李善，然后刘良或吕向又加以抄录。以下引用《文选》及其注文，主要依据是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文选》之影印本，间亦采用建州本以及胡克家本李善注《文选》，不复一一分疏注明。

不能探测之。”五臣亦照抄此段。

按照颜延年的旧思路去观察诠释《咏怀诗》，自然不可能对这些作品提出符合实际的解说；五臣的一些具体解说，牵强比附，尤其不恰当，但影响相当深远——不仅影响了阮籍《咏怀诗》的解说，对整个诗歌诠释的路径和方法都产生过很大影响。

近贤黄节先生研究阮诗用力甚勤，所撰《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版，1984年第2版；近又有中华书局2008年重排本，与《曹子建诗注（外三种）》合订为一册）一书最为通行，但似乎仍未能得其“归趣”。他这本诗注的影响也非常之大。笔者历年研读《文选》所录阮籍《咏怀诗》，曾经各为札记，现录出五则，请同道指正。

### 其 一

夜中不能寐，坐起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这首诗里充满了无可言说的忧愁和哀伤，所为何事，毫未涉及。按臧氏《晋书》的记载，我们可以推知这是因为当时有两支政治力量正在暗中角力，政治局势外松内紧，前途莫测，诗人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深感忧虑，却无法明言。

诗人这一段的经历，即所谓“蒋济辟为掾，后谢病去。为尚书郎”，不久又称病而归等等，都有着深刻的原因。《晋书·阮籍传》载：“太尉蒋济闻其有隼才而辟之……乃就吏。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据此可知阮籍之为尚书郎在正始十年（249）初高平陵政变以前，而其具体时间可以从《晋书·王戎传》中得到一点线索：

阮籍与（王）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郎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适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浑曰：“浚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

查王戎十五岁在正始九年（248），似此阮籍与王戎之父王浑同为尚书郎当在正始八、九年间，这时阮籍三十八九岁（诗人长王戎二十四岁，传中云相差二十岁乃举其成数而言）。任此职前后隐居于故乡期间，正是阮籍与山涛、嵇康以及几位年轻人结为林下之游之时<sup>①</sup>。据此又可知，他应太尉蒋济之辟为其属吏乃在此前，而不应曹爽之辟则在此后——那已是高平陵之变的前夜，已经风起云涌山雨欲来了。

魏明帝死前向重臣宗室曹爽、元老司马懿托孤，新接班的小皇帝曹芳只是王朝的一个象征，他完全没有实际掌握政权的能力。在并列的双雄中，就水平和功劳而言，当然是司马懿要高得多，但曹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排挤司马懿，将他架空，一时似乎完全得手；司马懿则故为韬晦，暗中准备大动作。正始中后期政局表面上似乎还算宁静，其实一场巨大的历史变动正在酝酿之中。

阮籍在这时很不愿意出仕，是十分明智的，但名人往往得不到安宁，所以他又不得不先仕于太尉蒋济，再出为尚书郎。按魏晋时代的尚书郎一职非常接近政权的核心部位。《晋书·职官志》云：“尚书郎，西汉旧置四人……及光武分尚书为六曹之后，合置三十四人，秩四百石，并左右丞为三十六人。郎主作文书起草，更直五日于建礼门内。尚书郎初从三署诣台试，守尚书郎，中岁满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选有吏能者为之。至魏，尚书郎有殿中、吏部、驾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库部、农部、水部、仪曹、三公、仓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别兵、考功、定课，凡二十三郎。青龙二年（234），尚书陈矫奏置都官、骑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试诸孝廉能结文案者五人，谨封奏其姓名以补之。”阮籍在二十五郎中的具体任职今已无从考见；所可知者其时领导尚书台的乃是一些非常显赫而不久以后即死于高平陵之变的著名人物。阮籍已入虎穴，他看出了这里潜伏着

<sup>①</sup> 详见顾农《七贤林下之游的时间和方式》，《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冬之卷；又收入《魏晋风度二十讲》一书，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危机，于是称病脱身，实行“天下无道则隐”的政治性撤退。

尚书台的最高领导称“录尚书事”，历来由公卿中权重者为之；其次有所谓“八座”，《晋书·职官志》说，曹魏时代“八座”由尚书令一人、仆射二人加上五曹（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尚书构成，尚书郎在八座领导下工作。当阮籍为郎时，大将军曹爽录尚书事，其心腹死党何晏、邓 、丁谧等人为尚书，朝政大权几乎完全掌握在这个集团手中。这些人在明帝时因“浮华不务道本”遭到罢退打击（详见《三国志·魏书·明帝纪》），现在重新浮出政局之表。阮籍正是在这样一个政治局面下出任尚书郎的。他之所以能任此清要之职，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他的才气和名声，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是名父之子，与何晏等人本来相熟。何晏幼时随其母归曹操，从此成为曹操之“假子”，而阮籍之父阮 长期担任曹操的秘书；何晏为著名思想家，研究儒道两家经典颇多新意，阮籍亦有理论兴趣，撰有论文数篇。他们之间有许多理由相熟。史称何晏“黄初时无所事任，及明帝立，颇为冗官。至正始初，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为散骑侍郎，迁侍中尚书……晏为尚书，主选举，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三国志·魏书·何晏传》注引《魏略》）。阮籍之入尚书台为郎，应当是何晏大力提拔的结果。阮籍在这里只干了很短一段时间就托病离去，大约是已经预感到这一帮新贵的所作所为必将没有什么好下场，形势微妙，不如离他们远一点；他此后托病不应曹爽的征辟也应当出于同一理由——他连尚书台尚且不愿久待，哪里肯与这一派的首脑人物曹爽发生更密切的联系，成为他直接的僚佐。“时人服其远识”无非是佩服他的政治远见——当时不少缺乏政治敏感的士大夫还认为天下太平形势不错呢。

今所见之《咏怀诗》八十多首自非作于一时，但创作时间前后加起来并不很长，全都写成于正始中后期退居于其故乡陈留之时，并即以其地名为题。其一这一首中所描写的具体环境，应当就是阮籍在其故园的坐卧起居之室。诗人忧思重重，夜不能寐，因有此作。诗中“孤鸿”、“朔（五臣作“翔”）鸟”二句写景乃是象征手法（阮诗惯用此种手法），互文见义，借以表现自己的孤独和痛苦。五臣注妄释“翔鸟”为“鸷鸟”，并说“以比权臣，在近则谓晋文王也”（吕向注），则属于牵强附会，一无可取。

从《咏怀诗》中若干篇什看去，阮籍最看不惯曹爽、何晏之辈的一点是他们奢侈荒淫的生活作风。“曹爽专柄，风化陵迟”（《三国志·魏书·王基传》）。史称曹爽不仅本人“妻妾盈后庭”，又“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何）晏等会其中饮酒作乐”（《三国志·魏书·曹爽传》）。何晏其人尤以“好色”著称，“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三国志·魏书·何晏传》注引《魏略》），性伙伴很多，他又是服食五石散（寒食散）的先行者和著名代表，其目的全在于滋补强壮，以济其欲。

正始年间已经完全腐败了的曹爽、何晏辈一味作威作福，而他们的对立面老奸巨滑的司马懿则深藏不露，正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正始后半叶表面平静，骨子里很紧张，头脑清醒的人已经看出了天下行将有变。其时敢于直言者固然亦有其人，如尚书郎傅嘏对曹爽之弟曹羲说：“何平叔（晏）外静而内铄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三国志·魏书·傅嘏传》）而比较世故一点的，或隐遁以观时变，如山涛（详见《晋书·山涛传》）；或依违于两派之间以避害取利，如李丰——其人时为尚书仆射，一度靠请病假混日子<sup>①</sup>，其人品虽不足道，却很可以由此窥见其时政局外松内紧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当时有一位关心国家大事的寡妇严宪，在考虑女儿的婚姻时甚至说过“（何）晏等骄侈，必当自败”（《晋书·杜有道妻传》）。阮籍属于傅嘏所说的“将远”之“仁人”，作此诗时他已经引身而去，回故乡陈留尉氏隐居了。

曹爽智商很低，一向糊里糊涂；何晏是聪明人，他也未尝不感到形势的严峻，其《言志诗》云“常

① 《三国志·魏书·李丰传》注引《魏略》云：“正始中，迁侍中尚书仆射。丰在台省，常多托疾；时台制，疾满百日当解禄，丰疾未数日，辄暂起，已复卧，如是数岁……曹爽专政，丰依违（曹爽、司马懿）二公间，无有适莫，故于时有谤书曰：‘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李丰兄弟如游光。’其意以为丰虽外示清静，而内图事，有似于游光也。”



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但他虽内怀忧虑，却不能改弦更张，在诗里又说“且以乐今日，其后非所知”，诚所谓欲罢不能。当时曹爽的长史应璩写了许多讥切时事的诗，总其名曰《百一》，“遍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为应焚弃之，何晏独无怪也”（《文选》卷二一《百一诗》李善注引张方贤《楚国先贤传》）。这种“无怪”很能反映何晏的特色：头脑虽然相当清醒，身子已经不能自拔。对这样聪明得如此糊涂的顶头上司，阮籍除了退避以及赋诗言志以外，其他也不能做什么了。

阮籍与曹爽、何晏集团并没有什么旧的矛盾，更没有深仇大恨，相反，乃是受他们重视与重用的社会名流；但阮籍实在痛恨他们的荒唐，为他们的前途担忧，同时更为国家的未来捏一把汗。

阮籍本人虽然全身而退了，但他仍然为天下国家担忧，只是又不便明言，于是只能含含糊糊地叹息道：“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人们总是会有些不便明言的痛苦和哀伤，内容各别，而难以言说则一。阮诗写出了这种情状，此所以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属于八荒之表也。

## 其 二

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环佩，婉娈有芬芳。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这首诗运用了神话中的材料。郑交甫遇二妃事，李善注引《列仙传》曰：“江妃二女出游江滨，交甫遇之。”又曰：“余与《韩诗外传》同，已见《南都赋》。”检《文选》卷四张衡《南都赋》“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句下李善注已先引《韩诗外传》曰：“郑交甫将南适楚，遵彼汉皋台下，乃遇二女，佩两珠，大如荆鸡之卵。”按后来的情形是：不知道她们是神女的郑交甫请其佩，遂手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

这个人神邂逅、彼此都动了一点感情的故事后来流传甚广，而在被用作典故时可以有各式各样的着眼点，阮籍在这里强调的是一见钟情，念念不忘，而很快就匆匆分手，从此更无消息。

阮籍《咏怀诗》中多次出现过各路神仙，男性居多，亦有女神。八十多首中涉及神仙的约占四分之一，这是很高的比例。与《文选》编者大抵同时的理论批评家刘勰云：“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康）志清峻，阮（籍）旨遥深，故能标焉。”（《文心雕龙·明诗》）他的意思是说阮诗借助于神仙表达自己的“遥深”之旨。黄节先生指出：“《咏怀诗》中多有言及游仙之事者，此乃嗣宗心烦意乱不知所为时作也。按《三百篇》所言虽多悲哀语，然而尚无言及游仙者。至《楚辞》则此种思想已勃然不可遏，盖世道之险巇，人心之恶劣，有以使之然也。此亦诗人自求解脱，强为旷达，以冀得精神上之安慰之一法。”<sup>①</sup>这是很好的见解；可惜他又一向认为《咏怀诗》是诗人“中年以后垂老时作品”，“所以独多哀怨之言”<sup>②</sup>，以高平陵之变以后的史料作为背景材料，这样诠释的方向就发生了根本的偏差，对阮诗中的游仙成分难以作出准确的具体解说。

通观《咏怀诗》中游仙诸作，主旨在于表达对于和谐完美的神仙世界的向往；反观当下，恰好相反，令人感慨哀伤。正始后期政治局面最大的特点在于两个政治中心对峙，一个是明的，相当腐朽的以曹爽为首的当权集团；一个是暗的，实力强大野心勃勃的司马氏集团，两虎相争，前景险恶。大魏王朝向何处去，自己未来向何处去，对此敏感的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忧心忡忡，精神上极其痛苦。所谓“竹林七贤”集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前形成的，他们都远离官场，喝酒谈玄，也谈谈神仙。阮籍的“仙心”鲜明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同时又具有它超越当下的一般意义。汉末魏初经历过一次大变动，瘟疫、灾害、战争、政争，死了许多人；未来恐怕又要有许多人头落地了。于是不死而且非常快活的神仙特别令人羡慕。越是社会问题大、人心不安宁的时候，神仙的身价就越高。真是人人都幸福了，还要神仙干什么！

① 萧涤非《读诗三札记》，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9页。据该书前言，书中的内容“基本上都是黄节先生所讲的”。

② 萧涤非《读诗三札记》，第18页。

高平陵之变前不久，曹爽曾经要阮籍到他手下去服务，阮籍用健康原因推掉了，曹爽大为不快，他手下一个叫伏义的人给阮籍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予阮籍极其严厉的批评，并提出威胁，非要阮籍出来捧场不可；最后又诱之以名利道：“盖自生民之性，受气之原，好恶大归，不得相远。君子徇名而不顾，亦有慕名以为显。夫名利者，总人之纲，集衢之门也。出此有为，于义未闻。吾子若欲逆取顺守，及时行志，则当矜而莫疑，以速民望；若欲娱情养神，不厚于俗，则当浩然恣意，唯乐是治。今观其规时，则行己无立德之身，报门无慕业之客；察其乐，则食无方丈之肴，室无倾城之色。徒泄泄以疑世为奇，纵体为逸，执此不回，既已怪矣。”伏义从十分庸俗的人生观出发，相信人总是要名要利的，要么成名，要么享乐，你阮籍既不肯当官以成名，又没有看到你享什么福，于是他就看不懂眼前的这个怪物了。官方俗物伏义完全不能理解阮籍，所以阮籍在给他的回信里完全不屑与之理论，只说生活方式不妨多元化：“人力势不能齐，好尚舛异。鸾凤凌云汉以舞翼，鸬鹚悦蓬林以翱翔，螭浮八滨以濯鳞，鳖娱流潦而群逝；斯用情各从其好，以取乐焉。据此非彼，胡可齐乎？”阮籍自己的生活方式确实如伏义所说，一是“疑世”，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持忧虑怀疑的态度；二是“纵体”，自行其是，不守礼法，“披发夷傲”（《世说新语·任诞》注引干宝《晋纪》）。同时他又寄意于神仙，拿来同黑暗压抑的现实世界作对比，寄托自己的希望。

神仙道教在魏晋之际十分流行，正始年间似乎平静其实凶险的形势很自然地迫使阮籍产生了一种远离政治、向神仙世界逃亡的幻想。同许多神仙道教的信徒不同的是，阮籍并不指望到神仙世界中去享受——他在实际生活当中尚且安于“食无方丈之肴，室无倾城之色”，当然更不会到神仙世界去追求这些了；他是要到那里去做精神性的避难。社会的黑暗和前途的渺茫已经使得阮籍觉得在尘世无法安身立命，最好能跟着赤松子、王子乔去仙境聊避风雨。

阮籍本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对神仙的存在将信将疑，而对自己能够进入仙境更不抱什么真正的希望，所以他在诗中写郑交甫遇江妃二女，得其所赠明珠，而转眼间已不可见，这只是反映了阮籍在理想失落后的幻灭之感和深沉的哀伤。美好的东西总是只能在头脑里短暂地存在，转瞬间已经无影无踪。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神仙也解决不了的。《咏怀诗》中的游仙诸作乃是阮籍的精神自传，因此其间不免有一些重复；短时间内写出大量的诗，很容易产生这种情形<sup>①</sup>。“二妃游江滨”这一首写法比较别致，与其他各首没有重复，萧统专门选录这一首是很有眼光的。

说起游仙诗，人们总是会首先想到郭璞，往上追溯，则会提到曹植、曹操以至于《楚辞》中的《远游》，阮籍很容易被忽略。一个人的所长很容易掩盖他的其他方面，在批评家取向明确的反复拂拭之后尤其是如此。其实阮籍在中国游仙诗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他的心态要比曹操、曹植复杂得多，应视为郭璞直接的先驱，他的有关作品应当予以充分的重视。

### 其 三

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娱乐未终结，白日忽蹉跎。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黄金百镒尽，资用常苦多。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黄注本列为其五）这是一首所谓“代言体”的诗，以一个后来“失路”的“轻薄”少年的口吻来说话，写他的悔恨和悲哀，同时指向更深远的意义。昔人解读此诗往往忽略这种代言的性质，误认作是诗人的自述；因为这些自述与阮籍的生平史料多有不合，于是又作出种种牵强附会的解说，如刘履《风雅翼》卷三《选诗补注》云：“此嗣宗自悔其失身也。言少时轻薄而好游乐，朋侪相与，未及终极而白日已暮，乃欲驱马来归，则资费既尽，无如之何。以喻初不自重，不审时而从仕，服事未几，魏室将亡，虽欲退休而无计，故篇末托言太行失路，以喻懊叹无穷之情焉。”此后沿着这个思路来解释此诗者甚多，而实非通解。事实上阮

<sup>①</sup> 曾国藩准确地看出了阮诗中有“语意重复，别无精义”者，但他怀疑有些诗出于“后人附益”（《求阙斋读书录》卷六）则无根据。

籍少年时并不轻薄好娱乐，恰恰相反，《晋书》本传说他“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山临水，经日忘归”，与诗中所述的情状大异。又阮籍不得已出仕于太尉蒋济以及为尚书郎都时间甚短，而且很快就急流勇退了，他分明是能够“审时”的。而刘履却说阮籍“不自重”、“不审时”，不知何据，颇不可解。又高平陵之变以后，阮籍出任司马懿从事中郎，此后一直追随司马师、司马昭，在这里担任各种职务，至景元四年（263）卒，其间似未尝为“退休”之计。刘履的解说处处与诗人的生平格格不入，无法接受。

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引蒋师爚曰：“此以少年蹉跎，终竟失路，为寓言也。驾返穷途，歌哭一致。”这是把此诗与《晋书》本传载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联系起来思考，似乎言之有据，但这样的比附仍然无从解释诗中的“轻薄”、“娱乐”以及“赵李相经过”等字句。

今按“轻薄”一词屡见于阮诗，大抵用来形容邪气十足、品质低劣、私德腐败、追逐名利之徒；这样一种外貌妖艳而本质低劣只能一时称盛的人物，与阮籍同时者，最典型的莫过于何晏。以何晏之有关史料与阮诗互证，处处合若符契。

何晏本是汉末大将军何进之孙，其父何咸早亡，其母尹氏被曹操收纳，何晏跟过去做了曹操的养子，以特别聪明得到赏识，地位几乎与曹丕相近。《世说新语·夙慧》称“何晏七岁，明慧若神，魏武奇爱之。因晏在宫内，欲以为子”；《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魏略》亦称何晏“无所顾惮，服饰拟于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尝谓之为‘假子’”。由于他的这一特殊身份，黄初年间未能出仕，至明帝时也只“颇为冗官”。他此时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有二，一是“善谈《易》、老”（《世说新语·文学》注引《魏氏春秋》），“以材辩显于贵戚间”（《三国志·魏书·傅嘏传》注引《傅子》）；二是生活作风轻薄荒淫，他着意于化妆美容，又率先服五石散（寒食散），成为鲁迅先生之所谓服药的祖师。《世说新语·言语》注引秦承祖云：“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也。”所谓“神效”当即指此药对于“耽好声色”（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卷六引皇甫谧《寒食散论》）大有补助之效。史称何晏颇多外遇，其夫人金乡公主极为不满。《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魏末传》云：“晏妇金乡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贤，谓其母沛王太妃曰：‘晏为恶日甚，将何保身？’母笑曰：‘汝得无妒晏耶？’”“为恶”即指其好色，多情妇与变童。何晏本是一个美男子，“美姿容，面至白”（《世说新语·容止》），阮籍诗中所谓“色容艳美姿”、“焕耀何芬葩”当即指此而言；但由于他生活放荡，不肯自爱，衰老得很快，史称他曾经请管辌为自己占卜，其时的尊容已变成“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三国志·魏书·方伎传》注引《辌别传》），这正是他荒淫好色与服用五石散交相作用之最后“神效”。何晏的外遇都是些什么人，史传中未载，今亦无从详考，阮诗中“赵李”或可概括之。前人释“赵李”意见多分歧，梁章钜《文选旁证》卷二及近贤陈伯君先生《阮籍集校注》引录颇备，一说赵飞燕、李夫人（颜延年），一说汉成帝小臣赵李（杨慎、顾炎武），一说赵飞燕、李平亲属（何焯），一说赵钦、赵欣、李延年（梁章钜），要之皆宫廷贵妇或佞幸小臣<sup>①</sup>，以何晏的特殊身份，他确实有条件与这一类人结为性伙伴。阮籍不屑具体言之，仅用“赵李相经过”一句一笔带过。

“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指何晏一伙由放荡的生活转而卷入政治，“三河”代指政治中心（三河指河南、河东、河北，秦之三川郡，《史记·张仪列传》载仪曰“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何晏在文帝曹丕死后开始活跃，“是时何晏以材辩显于贵戚之间；邓飏好变通，合徒党，鬻名于闾阎；而夏侯玄以贵臣子少有重名，为之宗主”（《三国志·魏书·傅嘏传》注引《傅子》）；到明帝罢退“浮华”时，何晏同他的一伙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详见《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及《董昭传》）；而到齐王芳时曹爽专政，这一帮人又纷纷东山再起。《三国志·魏书·曹爽传》称：“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于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这时

<sup>①</sup> 《晋书·梁孝王彤传》载：“彤以汝阴上计吏张蕃为中大夫。蕃素无行，本名雄，妻刘氏解音乐，为曹爽教伎。蕃又往来何晏所，恣为奸淫。晏诛，徙河间，乃变名自结于彤。”这个张蕃就是查明有据的何晏党徒之一（参见王伊同《补〈魏志·何晏传〉》，《王伊同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00页）。



何晏当上了举足轻重的尚书，典选举。《曹爽传》注引《魏略》云：“（何晏）至正始初，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为散骑侍郎，迁侍中尚书……晏为尚书，主选举，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又《曹爽传》云：“晏等专政，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有司望风，莫敢忤旨。晏等与廷尉卢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过，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绶，然后奏闻。其作威如此。”这一批政治暴发户作威作福，经济上贪得无厌，已经到了公开掠夺的程度；生活上穷奢极侈，也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连曹爽的弟弟曹羲都看不下去，“数谏止之”。阮诗中“黄金百镒尽，资用常苦多”当即指此而言，形容他们欲壑难填，虽疯狂搜括仍然入不敷出。

正因为如此，阮籍深刻地预感到这一伙人预后不良，他虽然未必能预测行将发生的高平陵之变，但当下这种腐败局面不可能持久，掌握权柄的以何晏为代表的这一帮“轻薄”政客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他认为是必然的。《咏怀诗》中涉及这一主题的篇什甚多，本诗是其中很典型的一首。

后来司马懿收拾曹爽一党时，先让何晏参与办案，“晏穷治党与，冀以获宥”（《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把其他人都治了重罪以后，司马懿最后来治何晏的罪。何晏临死前这一场悲喜剧充分表明了其人“轻薄”的本性。对这个人阮籍早已看得很透。

史籍中未载阮籍与何晏的交往，但《晋书·阮籍传》说过在曹爽征辟他之前，他当过一段时间尚书郎，即所谓“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而其时典选举的尚书正是何晏。

何晏曾经一度是阮籍的顶头上司，阮籍对何晏及其一党就近观察，知之甚深，他之所以托病而退以及稍后不应曹爽的征辟，正与此有关；他能写出本诗来，与他这一段经历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 其 四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噉噉今自嗤。（黄注本列为其十五）

诗人在这里写自己思想的变化：在青少年时代本来笃信儒家经典，以孔子的得意高足颜回（子渊）、闵损（子骞）为榜样，欲凭借高尚的德行流芳千古；可是现在要放弃这样的期许了。这是因为现实生活教训了自己，“荣名”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当下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是先得活着，如果过早地进入“丘墓”，那么就一切都无从谈起了。阮籍的思想已经由儒入道，而且对于神仙道教所说的长生不死也大感兴趣。老资格的仙人羡门子（此仙在史书中出现甚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取代颜、闵，成了他现在的偶像。

诗中提到“丘墓蔽山冈”，讲生命之可贵与虚名之无用，虽然好像是道家的老调，但在当下有着深刻的涵义。在权力中心不一、政局严重不稳的情况下，愈是卷入政治，身家性命愈是危险；一时的荣华富贵完全是靠不住的，是可怕的，不如敷衍隐逸、保住性命之为妙。阮籍在正始时代基本采取这种态度；但名士往往欲隐而不可得，总会有人拉他出山，阮籍的处境正是如此，他有时竟会感到死亡的阴影向自己逼进。在官方代表伏义的来信中，就有这样充满杀机的词句：“天官虽博，无偏驳之任；王道虽宽，无纵逸之流。苟无其分，则为身害教，贼怨布天下。以此备之，殆恐攻害其至无日，安坐难保。”这正是代表官方严重警告阮籍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如果坚持不肯合作，小心你的脑袋！

阮籍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曹魏政权初建、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之时，从小接受的是儒家的诗书礼乐教育，他“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是必然的。《咏怀诗》中又有表彰儒家的篇章（黄注本其六十“儒者通六艺”），对于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阮籍也充分予以肯定（黄注本其三十九“壮士何慷慨”）。青年时代阮籍衷心希望出现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礼乐刑政皆备、和谐正常的社会<sup>①</sup>；可是现实生活教

① 阮籍《乐论》写道：“刑教一体，礼乐内外也。刑弛则教不独行，礼废则乐无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车服、旌旗、宫室、饮食，礼之具也；钟磬、鞀鼓、琴瑟、歌舞，乐之器也。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治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阮籍在另一篇论文《通易论》中更从哲学的高度描绘出一幅阴阳协和、“万物莫不一”的一元化太平世界。

训了他，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大讲儒家理论的人，口头上一套，行为完全是另一套，阮籍的旧思路经现实的教训而完全被轰毁了。曹爽、何晏之徒就是这样的伪君子，他们手下的文人伏义尤其显得卑鄙委琐，他给阮籍的信开始还大讲儒家圣贤之道、建功立业之志，批评阮籍之高卧为“弃圣背贤”、“凌荣起名”，基调非常之高，但下文忽然拿出他们实际上念念不忘的名利二字来诱惑阮籍。对于阮籍之一再不肯出仕，不要高官之名利，而又没有躲在家里享受“方丈之肴”、“倾城之色”，表示完全不能理解。以儒家圣贤之徒自居的伏义不免露出了他们庸俗之至的狐狸尾巴。对于这种无廉耻的说教、低水平的劝驾，阮籍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只复了一封极短的信，冷冷地把他打发走。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确实无须对话。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者用以自利，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是亵渎了礼教，于是干脆不谈不信以至反对礼教。阮籍的心态确乎如此；他之所以无比藐视伏义之流，也正是为此。阮籍有一首诗正是讽刺他们的：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黄注本列为其六十七）

不过阮籍在诗文中态度虽然严峻，行动上却从不与当局硬顶，态度比较富于弹性。当蒋济征辟他时，开始不去，“济大怒；于是乡亲共喻之，乃就吏。后谢病归”（《晋书·阮籍传》）。此后又在曹爽死党何晏手下当过一段时间尚书郎，然后再设法离去。阮籍用诸如此类的办法苟全性命于乱世。他后来虽长期在司马氏手下服务，态度却相当潇洒，注意保持相对的个人自由；但他早年的儒家理想不免进一步彻底轰毁了。

质言之，阮籍青年时代本以儒家思想为主，希望出现一个稳定和平、礼乐齐备的理想社会，他本人立志为此作出应有的贡献；后来他发现这完全是梦想，不可能实现，社会正处于大变动的前夜，而礼乐无非是统治者骗人的东西——于是一变而为尊崇并且躬行道家的一套，希望反朴归真，过个人完全自由的神仙式的生活。

儒家理想毁灭以后的阮籍，只能以道家的精神自由为自己安身立命的依托；这种无可奈何而安之若素的安顿自己精神家园的思路，典型地见之于《大人先生传》。写这篇文章时曹爽集团已全军覆没，司马氏控制中枢，阮籍在司马氏部下从政。阮籍当然是支持司马氏的，但并非死党；司马氏并非他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他们是政治斗争中的赢家，而这也不过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而已。

诗人对时局有许多忧虑，有许多痛苦，最大的痛苦是他早年曾设想过的和谐有序的世界已经崩溃，而没有新的东西来代替它。阮籍总有一种无法排解的精神失落的悲哀。

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一文中描写当时的世界是“天固地动，山陷川起，云散震动，六合失理”，混乱无序，不可收拾；人的处境至为痛苦：“群气争存，万物死虑，支体不从，身为泥土，根拔枝殊，咸失其所”。这些很难说是系统化的理论，无非是阮籍对魏晋之际天下纷乱局面的诗意概括。世界既已如此，还能有何作为；此时而讲“礼法”，只能伤害百姓。阮籍激昂地写道：“尊贤以相高，竞能以相尚，争势以相君，宠贵以相加，驱天下以趋之，此所以上下相残也。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此非所以养百姓也。于是惧民之知其然，故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亡国戮君溃败之祸。此非汝君子之为乎！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危乱、死亡之术耳。”痛快淋漓地把“礼法”吃人的本质揭发得体无完肤。

阮籍借“大人先生”之口自述其生活旨趣道：“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鸿蒙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飘飏于四运，翻翱翔于八隅。……廓无外以为宅，周宇宙以为庐，强八维而处安，据制物以永居。”这就是要彻底超越现实世界，超越自我，遗世而独立；但这也只能是一个心造的幻影，事实上他只能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追求这一美梦，例如他确实置当时社会公认的礼俗于不顾，我行我素，惊世骇俗，一味清谈和酣饮；而同时却又很谨慎，避免谈及政治，也



从不臧否人物。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精神自由和政治压力的矛盾，阮籍始终未能解决。

唯其如此，写于正始中后期的《咏怀诗》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代表他在高平陵政变之后这时的心情——后期阮籍仍然相当苦闷，却没有写什么诗，可以由此得到某种解释。诗是包容性很广的东西，它并不完全是政治形势的投影，《咏怀诗》中的某些篇章反映了诗人哲学家阮籍的基本矛盾，这些矛盾在高平陵政变之后继续存在——这也正是过去将《咏怀诗》产生的背景错误地放在政变之后而不容易被发现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应当通过这些作品去更深入探讨阮籍的内心世界而不必限于一般的诗史互证。

重复地说，解读阮诗应当追求本质意义上的知人论世，深入到诗人的精神世界里去，体会他的心事浩茫、情寄八荒，而不能停留在史实与诗意的浅表。

### 其 五

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皋兰被径路，青骊逝。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黄注本列为其十一）  
此诗意指旧说极为纷纭。余冠英先生于“高蔡相追寻”句下注云“这里借蔡灵侯的事指斥魏主追求荒淫，不计后患”，又引刘履《选诗补注》云“正元（魏高贵乡公曹芳年号）元年（公元154年），魏主曹芳幸平乐观，大将军司马师以其荒淫无度，褒近倡优，乃废为齐王，迁之河内……嗣宗此诗，其亦哀齐王之废乎？盖不敢直陈游幸平乐之事，乃借楚地而言”，余先生说“刘说比较近理”<sup>①</sup>。

今按刘、余之说似非通解，且有明显的时代之误。正元乃高贵乡公曹髦年号，齐王芳年号为正始、嘉平。嘉平六年（254）九月曹芳被废，另立曹髦，十月改元正元。曹芳被废前夕幸平乐观，乃为阅兵而非游乐，与荒淫等等无涉；曹芳的亲信拟在平乐观设计杀害司马昭，对付司马师，种下了被废的祸根。曹芳之所谓荒淫无度、褒近倡优乃是他被废时的罪名，先是由太尉、守尚书令司马孚领衔，包括司马师、司马昭在内的大批文武要员联名上奏，称“皇帝即位，纂继洪业，春秋已长，未亲万机，耽淫内宠，沉漫女色，废捐讲学，弃辱儒士，日延小优郭怀、袁信等于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戏，使与保林、女尚等为乱，亲将后宫瞻观……帝肆行昏淫，败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弥颓，凶德浸盛。臣等忧惧倾覆天下，危坠社稷，虽杀身毙命不足以塞责。今帝不可以承天绪，臣等请依汉霍光故事，收帝玺绶。帝本以齐王践祚，宜归藩于齐”云云，见于《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嘉平六年九月注引王沈《魏书》；该《纪》正文云：

大将军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皇太后；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沉漫女德，日延倡优，纵其丑谑……遣芳归藩于齐，以避皇位。”是日迁居别宫，年二十三。

是太后之令大抵径抄司马孚等人的奏章，其内容是否完全属实，恐怕须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从生活作风方面打开缺口，从而彻底打倒其人，历来是政治斗争中常用的行之有效的一种手法。高平陵之变以后，曹芳由曹爽等人手中的工具一变而为司马氏手中的傀儡，如果他仅仅荒淫无道，本可以继续当他的傀儡，但他介入了反司马氏的密谋，这样就当不下去了。但奏章和诏令对这一点都避而不提。许多本质性的东西在官方文件中往往总是避而不提的。要之，太后下令废曹芳出于不得已。同《纪》注引《魏略》云：

景王（按指司马师）将废帝（按指曹芳），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与帝对坐。芝谓帝曰：“大将军（按指司马师）欲废陛下，立彭城王据。”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将军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备非常，但当顺旨，将复何言！”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口有所说。”芝曰：“何可见耶？但当速取玺绶！”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玺绶着坐侧。

① 《汉魏六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1—152页。

可知下“旨”者实际上乃是司马师，而太后不过是在胁迫之下不得已取下玺绶并下诏废曹芳而已。《魏略》又称：“帝（按指曹芳）受命，遂载王车与太后别，垂涕，始从太极殿南出，群臣送者数十人，太尉司马孚悲不自胜，余多流涕。”司马孚乃领銜上奏章者，至此乃“悲不自胜”，看来他也只是司马师手中的一个工具；群臣的态度如此，似可见曹芳品行虽然有些问题，恐怕也还不至于恶劣到那种程度。刘履的解释难以取信。

诗中涉及楚人、楚地、楚事，诗意当由此入手来探求。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六曰：“此篇以襄王比明帝，以蔡灵侯比曹爽。嗣宗，爽之故吏，痛府主见灭，王室将移也。”此后陈沆《诗比兴笺》、曾国藩《十八家诗钞》等并从其说。此说不无合理因素，曹爽谯郡人，亦可大而言之曰楚人，其人确实相当荒淫奢侈，俱载于《三国志·魏书》本传；曹爽手下的亲信何晏（南阳宛人）、邓飏（南阳新野人）、丁谧（沛人）三人皆楚人，浮华骄奢，时人称为“三狗”（见《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魏略》），阮籍对他们相当了解。这些人不顾身后之患，阮籍担心他们早晚有灭顶之灾，诗中“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正当是为此而发。明帝如何，与本诗则无涉。

按曹爽虽曾征辟阮籍，但阮籍“以疾辞”，并未到任，所以阮籍并非曹爽之故吏，曹爽也不是阮籍的府主。对于曹爽集团的覆灭，阮籍未见得如何伤心，事实上不久之后他很快就出任诛灭曹爽的司马懿之从事中郎。

《咏怀诗》其十一当作于高平陵政变之前，而非曹芳被废之时；此时山雨欲来，阮籍已敏锐地预感到天下将有巨变，预后难以估计，不禁为之涕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天下兴亡历来多感慨，敏感的诗人阮籍更是如此，这与所谓“痛府主见灭”无关。

此诗从长江、枫树写起，三、四两句写青马骤驰于路，感叹光阴流逝，五、六两句远望之悲实即兴亡之感，七、八两句暗指何晏等曹爽党徒的奢侈荒淫，末四句写他们一时称盛，如“朱华振芬芳”，于是放纵忘忧，像蔡灵侯似的“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战国策·楚策四》），很可能要彻底翻车，正如“自以为无患”的黄雀行将为公子王孙所捕食一样。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历史上的教训鲜明地出现于诗人眼前，他感慨系之，以致禁不住怆然涕下矣。

[作者简介] 顾农，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发表过专著《建安文学史》等。